

## 編者按

與以往的文革研究不同，本期三篇文章有以下兩個特點：一、大量利用新解密檔案和當事人傳記等資料；二、從國際(特別是中蘇)關係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內政變化，也即從「以俄為師」到「以蘇為鑒」來分析文革起源。

1964年是中國政治經濟發生關鍵性轉折的年份。為甚麼毛澤東置當時剛剛經過三年困難時期的現實於不顧，突然決定改變國民經濟的「恢復、調整」戰略方針？李丹慧重點考察了毛澤東在1964-65年思考中國發展戰略的三方面變化：一、儘管越南戰爭仍在升級，但中美已通過第三方達成某種默契，美國不再被視為首要敵人；二、中蘇關係從意識形態論爭發展為邊界軍事摩擦不斷惡化，實際上蘇聯已構成對中國安全的威脅；三、真正影響中國命運的是中國政權性質。倘若這樣，那自然就必須把反修防修從國際引向國內政治鬥爭。李向前不同意以往認為外部環境，特別是越戰的升級，導致中國基本戰略由恢復經濟轉向戰備的看法。他認為，當時越戰和外部壓力並沒有達到危及國家安全的地步；事實上，應該從當時中外關係以及國內政治「緊張」相互激化的角度來理解前述轉變。只有依據毛澤東「和平時期必然要出修正主義」的政治邏輯，全黨才會服從毛更改以「吃穿用」為重點的三五國民經濟計劃，而代之以加強戰備作為必要的政治動員。牛大勇分析在冷戰國際環境下，從蘇共二十大、波匈事件，到中國反右運動、大躍進、廬山會議，中共領導核心如何在毛澤東政治哲學的引導下，為了反對國際敵對勢力的「和平演變」、防止「赫魯曉夫式的人物」在中國取得政權，而走上「文革」之路。